



多东西，是大家不甚了了却又很重要的。”

郅元宝举例，“鲁迅花了大量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。1938年版的《鲁迅全集》，翻译作品和个人著作的篇数对比几近1:1。一般爱好鲁迅的读者，对他的翻译作品看得大概比较少，但是，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，如果你不这样去深挖他的翻译作品，就很难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。鲁迅很重视翻译，认为翻译是运输精神食粮的航道，航道堵塞了，恐怕大家是会饿死的，会‘由聋而哑’。顺带一提，就我所知，‘精神食粮’这个说法，就是鲁迅在谈翻译的时候使用的概念”。

“另外一个，拿来主义。鲁迅甚至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盗火。翻译的经验及感悟，‘字典不离手，冷汗不离身’。我讲这一点，是想强调，鲁迅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。从鸦片战争开始，一些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，到了鲁迅这一代，我们通过其翻译作品，其对各国文化的接触，可知何谓文化的巨人——吸收更多营养，原创愈加丰富。从前，有观点以为，

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前的雕塑。



鲁迅的翻译作品，常注重弱小、被压迫的民族；但我后来发现，这主要是他和周作人编译《域外小说集》时候的状态，我们不要忘了，注重弱小、被压迫民族的同时，鲁迅也关注着欧洲，包括意、法、德、英等国以及美国的文学。所以，他是一个和世界文化潮流息息相关的、开放型的现代中国作家。他挥着毛笔、穿着长衫，但实质上既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，更是一个世界人——在此层面上，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不足的。”

“世界人”鲁迅得到了世界人的推崇。1937年，日本出版了七卷本的《大鲁迅全集》（这“全集”出得比中国都早）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竹内好翻译的《藤野先生》，先后被筑摩书房、三省堂选为“高中国语教科书”的现代文课文。仙台市博物馆则立有一尊鲁迅雕像，傲岸睥睨的样子，与人们印象中的他别无二致。雕像旁高达4.5米、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碑，碑名由郭沫若题写，建于1961年，“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互相敌视的年代”。日本文学界颓废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，亦曾写过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式小说《惜别》，竹内好气愤于小说败坏了鲁迅形象，是太宰迎合了日本当时内阁情报局的需要，但剧作家井上厦却觉得这是他最爱的太宰作品，太宰把鲁迅写成这样，盖因“非常喜欢鲁迅”。

喜欢鲁迅的外国朋友可真不少。1926年1月12日，罗曼·罗兰即给《欧罗巴》月刊的负责人L·巴扎勒热特（L. Bazalgette）修书一封，内容是积极推荐《阿Q正传》：“我手头有件短中篇（长的短篇）小说的稿，作者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小说家之一，把它译成法文的，是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文本的年轻译者敬隐渔。……你要不要读一读这个中篇的译稿？否则，我将另找门路。请您在《欧罗巴》发表它吧！……”

1936年，普实克（Prusek, Jaroslav；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）着手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。应普氏之邀，鲁迅在逝世前3个月，带病撰写了《〈呐喊〉捷克译本序言》。在序言中，鲁迅表示：“我的作品，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，这在我，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。我想，我们两国，虽然民族不同，地域相隔，交通又很少，但是可以互相了解，接近的，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，现在还在走——一面寻求着光明。”1950年，由普实克领导的捷克文化代表团访华，他和其他捷克汉学家亲手挑选了2.7万多册中国图书（部分为中方礼物）带回国，并在捷克社科院成立了“鲁迅图书馆”。

郅元宝补充道，“我们还有一个国际鲁迅研究会，疫情之